

物華天寶

明文史稿

第四輯

允傑陸璽

明水文史資料

第 四 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水县委员会
学习文史委员会

1991·明水

明水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水县委员会

学习文史委员会出版

明水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 字数80000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

黑新出图(91)392号 工本费:1.90元

目

录

忆伪满时故乡的苦难·····	孙志棠(1)
苦不堪言的学徒生活·····	赵荣第(9)
小学生痛打曹瞎子·····	赖振洲(14)
记信国选老师·····	于景荣(16)
记深受爱戴的好老师——信国选·····	赖振洲(20)
关于回忆信老师的拾遗·····	张宏大(24)
大谷马戏团事件·····	于惟中(26)
明水县的戏曲事业·····	郑洪亮(30)
回忆五十年代我县的电力事业·····	乔世清(48)
我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·····	于春霖(54)
太平鼓今昔·····	于景荣(58)
我在街道工作的一段经历·····	张玉英(66)
推行速成识字法的回忆·····	耿存志(70)
我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·····	陆振寰(77)
我县电影事业的发展·····	郑洪亮(80)
明水女篮从五十年代崛起·····	李东阳(92)
我在老明水二中的几段经历·····	宇恩孝(101)
回忆明水县报·····	吕斯塞(107)
明水艺校建校之初·····	陈云鹤(113)
我县率先普及广播网·····	吕世申(117)
多极火花塞的诞生·····	郭景富(119)
解放战争时期我县的拥军支前工作·····	宇恩孝(127)

忆伪满时故乡的苦难

孙志棠

在县城东北35里地，有一个荒凉偏僻、空旷寂寞的村庄，那就是我的故乡——白家店（现永兴镇所在地）。

1938年，我10岁的时候，随养母住进了这个贫穷困苦的地方。当时的白家店只有几十户人家，人口不到500，基本上是以农为业，靠种地谋生。站在屯子的南头可以看到北头，中间有几个行人在走动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高高低低、东扭西斜的茅草房没规则地、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这块土地上。“街道”上一向是冷冷清清、萧条破败的景象，什么年呀，节呀的，大体上都是一个样。

白家店的大户人家要数南头的林二爷和北头的烧锅老板顾元庆了。林二爷家究竟有多少人口，当地人谁也不清楚。他的土地和羊群在白家店，人却在县城里居住，几十垧土地和上百只羊的羊群，由佃户张某给耕种和经管。张家有十几口人居住在一起，用林二爷的车马，耕种着林二爷的土地，因此张家在人们心目中也是大户了。北烧锅的顾老板有多大家业，有多少口人，人们也不清楚。人们清楚的是顾某有一妻三妾，四房“女人”。有一年夏天晚饭后，顾某领着花枝招展的四房妻妾，从屯子的北头一直走出南门外，样子很神

气，大有在穷人面前，特别是在单身汉面前，炫耀显示一番的意思。在白家店住着一个他的大“女人”，三“女人”在县城居住，其余二个“女人”都在什么地方居住就不清楚了。顾本人并不长住白家店，烧锅是由雇来的掌柜代为经营。顾一年之中总有几次领着“女人”到烧锅去查看情况。

在白家店住的绝大多数是贫苦百姓。他们有些人是种自己的响八瘠薄土地，有些人是扛活（当长工），也有的人是“打闲”（卖零工）。人们过着半饥半饱，糠菜半年粮的艰难生活。大米，在那时是多年不见的珍品；白面，每年总能吃上几次，那须是逢年过节的日子。平常日子来人去客或给病人做点汤汤水水，能见到点细粮。来人去客也并非家家都能有细粮接待，能用细粮招待客人的也只是部分人家。

每年农历的六月下旬，土豆、豆角下来了，人们便松口气，孩子大人都很高兴。因为这时靠土豆、豆角、茄子之类可以填饱肚子了。

按理说秋天应该是农家乐季节，大车小车，背扛肩挑地收回自己血汗换来的丰硕成果。然而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——庄稼上场，脱粒未完的时候，那些给日本鬼子当爪牙狗腿的伪官吏们，就凶神恶煞地来到农村催逼出荷粮了。他们肥吃肥喝地住在地主家里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把一些交不上或交不齐出荷粮的农民集中到地主大院子里，有时也集中到村公所的院里或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，让这些农民跪一大溜。这些爪牙们由着性子大发淫威，对农民施以残酷的折磨。打嘴巴是最通常的打法。有的人用自己手中的“文明棍”打人，有的人是一天棒子不离手。打人最狠的要数吴兴奎（人称吴瞎子）和衣泰山（外号叫衣大棒子）。农民编顺口流说：“不

怕天旱水涝，就怕吴瞎驴子来到。”衣大棒子就是因为棒子不离手而得名。有一年秋天衣大棒子在白家店的东沟催出荷粮。用棒子打农民于长河的妻子。旁边有人求情说：“她已经怀孕了，饶了她吧！”衣大棒子边打边说：“她就是揣的龙驹，我也要揍她！”记得有一年秋天，被打得最惨的是吴文奎和外号叫李大银元的俩位农民。吴文奎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，领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度日，挨打这天晚上，父子二人已经在场院里劳累了大半夜，累得筋疲力尽，又冷又饿。爷俩商量着进屋歇一歇，暖一暖身子。不料，他们进屋不到半支烟的功夫，催粮的狗腿子们来了，见场院里没人，就火了，到屋之后不由分说，就没头没脑地打开了。第二天，人们看到吴文奎的时候，只见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脑袋大包小包地肿得稀暄。李大银元是和吴文奎同一天晚上挨的打，伤不比吴文奎轻。

有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我正在姨娘家里，听邻居说，不好了，催“出荷”的来了，我姨父赶忙跑到房后躲起来。这时，听外面不是好声地吼叫着找人，我姨娘赶忙出来，我担心地跟在姨娘的身边。这时，一个手拿棍子的狗腿子突然发现场院边堆着一堆脱完粒的葵花籽头，立刻吼叫起来：“不打场送粮，先打这个鸡巴玩艺干啥。”说着上前一脚，把一个葵花籽头踢飞起来有一房多高。我真害怕，紧紧贴在姨娘身边，这时我感到姨娘也在嗦嗦发抖。狗腿们吼了一阵走开了，到别人家施淫威去了。这时，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第二天，听人们说，昨晚领头的那个狗腿就是于督励官，农民因为交不上每户十斤线麻而挨打的人也不少。此外棒子队训练、抓劳工、检查国兵都是农民须过的关口。总之在那个年月农民

挨打挨骂，受人欺凌污辱的事随时随地都有，人权几乎已被褫夺殆尽，没有什么“保障”可谈。

人们的衣着更是褴褛不堪。那时在穷人中流传着一句俗话，叫作“笑破不笑补”。一件衣裳往往是补丁上面打补丁，补得五颜六色，除极少数富人之外，大家都是一个样子，因此谁也不觉得奇怪，更谈不上讥笑的事了。有不少人是冬夏一身装，冬天棉衣拆除棉花就是夏衣。我家有个姓苏的邻居，家中一个男孩已经十二三岁了，冬天没有衣服穿，身上披着一块破烂不堪的被头，胸前搂着一个用黄泥做的火盆，孩子大，被头小，稍一动弹就露出了身体。一个姓方的农民领着自己十多岁的女儿给地主放羊。时至深秋，冷风飕飕地刮，天开始飘起了雪花，父女俩每人在自己身上裹一条麻袋。过去，我听说过穷人披麻袋的事，但我看到的这父女俩并不是把麻袋披在身上，而是围在腰上护住两腿，腰间用麻绳系住，样子象一条麻袋裙子。严冬到来的时候，屋里除了做饭烧火之外，各家取暖工具只有一个黄泥火盆。到夜深时，人们冻得受不住，就起来点燃明火取暖。许多人家都会这种办法。人们在秋天的时候就有准备地把麻籽杆、葵花籽杆、柳条之类火旺烟小的燃料保存起来，作冬天明火取暖的燃料。

脚上穿的鞋子用料和式样颇多，多数是连补带纳的布鞋，以结实耐用为好。为了结实，人们常常把刚做好的一双新布鞋，在鞋前尖上抹上一层油渣子。这油渣子是从大铁车、花轮车的车轴上刮下来的混上泥土的油渣子。我就穿过这种鞋。社会上的物质越来越贫乏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穷困，人们想出来的过穷日子的办法也越来越多。在1940年以

后，陆续出现了多种原料做成的鞋子。冬天能穿上一双又暖和又轻便的蒲草鞋，那当然就是很高级的了。人们把线麻编成辫子，把辫子一圈圈、一层层地盘起来，再用捻的细麻绳串连在一起，制成麻辫鞋。这种鞋的特点是既结实又保温，穿起来很舒服。还有用料比这更经济的鞋，那就是玉米叶鞋，这种鞋穿在脚上既轻便又舒适，冬夏都可以穿。农村真有巧妇女，她们能用手捻同棉线粗细差不多的细麻绳，既细且匀；巧手的妇女们就用它在玉米叶鞋的鞋脸上“绣”出盘肠、豆腐块、卐字等多种图案。把一双漂白的玉米叶鞋打扮得美观大方，漂漂亮亮。我想，假如现在拿出一双精致的玉米叶鞋，和某些正工艺品相比较，也不会逊色。

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很贫乏。用白土子代替肥皂，煮黄草作染料是人们普遍采用的方法。在白家店的东门外和于通驿屯之间，有条数丈深的南沟，在沟底南帮露出了白土（白垩土层）。不知是谁首先发现这白土子可以用来洗头，也可以洗衣服。这白土子确实帮了人们的大忙：用它洗头，头发松散黑亮；用它洗衣服，涮掉砂砾之后，衣服确实很干净。因此周围数里村屯的人们都到这条沟里去挖白土。夏天还要多挖些储存起来，以备冬天使用。由于采挖的人多了，把沟的南帮掏进很深一个洞。我曾爬进洞里挖过白土子，现在想起真够危险的了。白家店屯子的南边是南北走向的沟筒子。人们叫它南沟子。南沟子有泉水，夏天铲地时，周围田地里的人们到这里来喝水止渴，还有天然的油池，池塘里有泥鳅和田鸡。农闲时人们成帮结伙地到池塘去捉泥鳅，抓田鸡。夏天满沟筒子都是奇花异草。在萋萋芳草之中有一种草，其茎叶中含有黄色色素。当地人们叫它黄草（它的学名，我迄今也不知道）。

人们在夏天把它采回来，洗净放在锅里煮沸之后，鲜艳的黄色便留在汤里，这时把需染的白布或衣服等物放在锅里再煮一会便成了黄颜色，穿起来比白色衣服好多看了。

滤灰水代肥皂和碱洗衣服，也是人们普遍采用的方法。把烧柴的灰烬装进一个没梁的筐头里，把筐头坐在一个搪有两条棍的空瓦盆上面，然后，往筐头里加水，水通过灰层滤到瓦盆里，这灰水便带有很浓的碱性了。用它洗白色以外的各种衣物都非常干净。

人们的居住条件更差。绝大多人家住的是非常简陋的茅草房、土平房、马架子，也有住地窖子的。用大木头支撑着的东倒西歪的危房到处都是。那时在农村根本见不到砖瓦结构的民宅。最简陋的房子要算地窖子。结构简单，保温性能良好。这种房屋的建造办法，大体和现在人们建保温鸡鸭舍相似。地下挖深一米。地上砌上一米高的土坯，两面慢泥，再加上房盖，房屋就建成了。在白家店南门外，就有个地窖子，住着姓孙的老夫妻俩。一年冬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走进了地窖子。屋里虽然阴暗少光，却也感到很是温暖，进出地窖子都要十分小心，因为进时须下“台阶”，出时须上“台阶”，一有不慎便会跌倒。一家人住个独门独院的也很少，多数都是一个屋里挤着几户人家。两间房住两家、三间房住四家的情况很多。两家人住南北炕是普遍的。三间房住两户人家那就算条件较好的了。

屯子北头有个刘铎炉，能给马挂掌，还能铸铎。这个规模极小的手工作坊，就算白家店仅有的“重工业”了。此外还有个北烧锅和朱豆腐坊，百分之百是手工操作。刘铎炉只在几年之内便破产倒闭了。大约在1936年左右，在北街路

东出现两家挂布幌的商店。两家商店南北比邻，南屋大兴隆，北屋大兴长，开业的头三年似乎有些生气。布幌、货架和柜台都是新的。为了招徕顾客，大兴隆还买来一架“洋戏匣子”（留声机）。戏匣子一放，孩子大人很快就聚拢来一帮。以后，大兴隆又买回一台“无线电”（收音机）。这是白家店历史上第一台收音机，这在当时是轰动遐迩的重要新闻。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赶到这家商店听收音机。不管收音机里播放的是什么内容，对人们都有吸引力。三年之后，随着人们贫困程度的加深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，两家布幌商店，也日见惨淡萧条。布幌上面鲜艳的红色早已不见了。上面用大绒镶嵌的黑字招牌也已丢笔少划，两条蜕变成灰蒙蒙的布幌，下端的边缘已是丝丝缕缕的了，在凄凉的秋风中摇摆飘荡。店中的伙计少了，柜台和货架由于货物减少，再加上座门朝西开的东厢房屋里，显得格外空荡阴暗。大兴隆的屈掌柜和大兴长的王掌柜开业时的兴高彩烈，满面春风的神采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，脸上的皱纹加深了，而且又增添了许多细碎纹理，白发有了明显的增加。他们常常是目光呆滞地面对自己日见破落的店铺紧锁双眉。大约在1941年左右这两座勉强支撑的大厦终于坍塌倒闭了。

在祖国光复的前一二年，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统治更加严酷，经济上的搜刮达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。我的故乡白家店，本来就是穷地方。这时人们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、走投无路的地步，风里来雨里去地劳累一年，结果只落得忍饥挨饿，狗皮、麻袋都当做衣裳披裹在身上。

1945年秋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家乡人民也和全国同胞一

样扬眉吐气了。解放初日子虽然还相当穷困，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人民腰直起来了，头抬起来了，胸挺起来了。以主人翁的身分重新安排家乡的山山水水，重新安排自己的新生活。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，从互助合作到农业合作化，直至今日，故乡的人民迎着改革的浩荡春风，用勤劳的双手已经改变了并且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振兴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奉献。

苦不堪言的学徒生活

赵荣第

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，我18岁那年（1938年）离开老家（河北省乐亭县）来到明水县，经乡亲介绍，到“福顺号”当学徒。

“福顺号”座落在现明水镇卫生院处，是明水县有名的杂货铺，生意兴隆，其它杂货铺都不能与之相比。福顺号有特别严格的铺规，在福顺号当店员，特别是“年轻的”，真是太难了，所受的苦处，是当代青年所想象不到的。和我同年进福顺号的有十几个人，我们这些人被称做“年轻的”。头一年，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站柜台，完全是参加体力劳动。日常活计就是开板、开窗、扫地、擦桌、取货、送货、点烟、倒茶，给掌柜的（也称经理、老板）铺叠被、打洗脸水等。这些日常活计听起来也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却大有文章。比如扫地，要先浇水，地面上不干不湿，扫起来笤帚往前平推，既不能扬起一点尘土，也不能和泥；点烟不能在客人鼻下划火，要半转过身去划火柴，再转过身来把烟点着，免得硫磺味熏人；倒茶讲究七分碗，倒满了不行，倒半碗也不行；擦桌椅得把各个棱角都擦到；开板，开窗要轻手轻脚，不能有太大的响动；铺床叠被讲究平、净、匀、整；洗脸水

的多少、冷热都得适宜。凡此种种，干不好都要挨训斥。早饭后，我们的任务大多是给买主送货，大宗货物用车子推，零星货物就手拎肩扛。到了买主家里还要表现出文质彬彬的样子，说话不能粗声粗气。走在路上，两臂下垂，自然摆动。无论冬夏，室内室外，都不准袖手，藉以显示福顺号的好店风。还有一条规矩是最难受的，那就是“年轻的”头三年不许坐着。从天放亮起床开始，一直到晚间睡觉，除吃饭时间可以坐一会儿外，一直是站着，站得两腿浮肿，又酸又麻，如果偷着找个地方坐一会儿，那就觉得是一种享受。

福顺号设有个外栈，座落在南二道街，距商店约700米。外栈是收粮、贮货的地方，车马、宿舍、磨房、厨房，都设在这里。外栈专设一名经理，他就是福顺号管后勤的，责任重大，权力更大。他的话象“圣旨”一样，谁若不听，立刻被“算”（就是解雇）。一旦被算，不光砸了饭碗，就连亲戚朋友、街坊邻里都瞧不起你，使你没脸见人。所以，我们这些“年轻的”都怕他，谁也不敢不听他的号令。福顺号百十来人的生活问题全由他管。为了省钱，福顺号从来不买菜，自己有菜地，有多少菜地记不清了，反正这百十号人的全年吃菜都由菜地解决。这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任务，当然由我们这些“年轻的”承当。雨天一身泥，风天两眼土；早上冷飕飕，午间汗渍渍，也真够苦的了。尽管如此，对我们这些“年轻的”来说，比在掌柜的眼皮底下过拘谨日子宽松得多了。

冬天到了，这是最难熬的季节。福顺号外栈每年收购很多的粮食。把粮食运到安达卖掉，赚了钱买回日用杂货卖给

农民；赚了农民钱，再买农民的粮，如此周转，年复一年。打场卖粮是最冷的时候，大车小辆到福顺号卖粮的却络绎不绝。白天在商店劳累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我们这些“年轻的”还要接受严峻的考验。一天所收的粮食，不管多少，必须全部上垛封好，第二天及时外运。当时粮栈不只福顺号一家，竞争相当激烈。谁落后一天，赶不上好行情，就要少赚钱，甚至有赔本的危险，真正体现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。天刚黑下来，我们便开始了繁重而紧张的劳动。体力弱的拎马蹄灯、撑麻袋口，体力强的打撮子（用铁皮制的簸箕）往麻袋里装粮。外栈经理在一旁监督，谁也不敢稍有松懈。十几分钟过后，提灯的人，撑袋口的手脚冻得如猫咬一般；打撮子的，汗水蒸发透过棉袄，脊背上挂满了白霜。外栈经理也是人，尽管穿着较厚，长久站立也接受不住。当他进屋取暖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才能搓搓手、跺跺脚、直直腰。眼看着粮堆一点点缩小，我们的心情也由沉重逐渐轻松了一些。每天大约都在十一二点左右才能完工。当然，也有时提前或拖后，这要看当天收粮多少来决定了。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去睡觉的时候，却发现每个人的“铺盖”上放着一捆破麻袋，还得把这捆破麻袋补好才能睡觉。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。

我们这些人，是为了吃碗饱饭，和养活一家老小才到福顺号来受苦受累的。然而，在这里几乎是天天挨饿。早晨6点（冬季）起床，晚上12点睡觉，每天劳动18小时，别说是血肉之驱，就是铁打钢铸的也得浇点油啊！饿极了，我们这些人只好冒险了。开始厨房里有豆腐，我们就偷着吃豆腐。大师傅发现天天丢豆腐，怕经理责怪，又不好意思告我们的

状，就把豆腐锁了起来。不久，我们又想出了新招儿。福顺号荤油有的是，用好几个大缸装着。我们就到菜窖里掰些菜帮，沾上荤油往嘴里填。经理看不见，大师傅假装不知道，这样我们总算填饱肚子了。

腊月以后，卖粮车不那么集中了，外栈的活计少了，商店里是一年最忙的季节。白天忙一天，晚上还要包“包”，到十一二点钟。冬天两顿饭，下午3点吃饭，到了晚8点就饥肠辘辘了，到了10点钟就前心贴后心了。这里既没有豆腐又没有荤油，起初我们只好忍着，后来终于又想出了办法。商店里有大海米，它可以充饥，但是吃多了太咸，吃少了又不解饿。于是，我们就偷着抓一把大海米放在茶杯里用开水泡上，三五分钟换一次水，咸味泡掉后，抓起一把，转过脸去，送进嘴里。此时，心里却怦怦直跳。

经理们也是人，他们也知道饿。可是人家饿了吃夜宵。夜宵除了吃烧鸡花钱买之外，其余都是厨师煎炒。今天吃炸鱼，明天吃炒肉，后天煎鸡蛋，一天换一个样，多少天也不重复一次。

厨房距商店大约一里多地。我们这些“年轻的”，如果谁能轮上去厨房给老板们端饭端菜，那可太幸运了。走出厨房就可边走边吃，虽然不能吃饱，也能解馋解饿。老板们酒足饭饱之后，我们急忙点烟、倒茶，烟茶用毕，要安安稳稳地睡觉去了。这时，我们才能去享受这睡觉之福。

我们成年累月地挨饿受累，能换得多少报酬呢？这个数字相当惊人：每月3.5元，每天0.117元（当时市场每个烧饼5分钱）。尽管待遇如此微薄，我们为了保饭碗，还得“服服贴贴”地为福顺号效劳。

解放后，国营企业相继兴起，五种经济成份并存。我也不甘心再为每月几元钱的工资而折腰。于是，我自酬资金到通达搞了个“小本经营”，起初还好，后来受同行的排挤，被迫停业。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通达供销社号召我们入股入社。我东挪西借凑齐了100元钱做为股金，加入了通达供销合作社。不久，就接任会计工作。我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可是又背上了一个“私方”的包袱。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，竟因为100元的股金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卸掉了“私方”的包袱，我从此轻轻松松地当我的会计，工作上很有起色，领导上又很信任我。后来又先后调到友爱供销社和县糖厂担任会计。在此期间，我曾先后多次被评为“季度”、“年度”先进工作者。

现在，我已经退休了，安度着幸福的晚年。